

# 寻求中美日 相互安全的基点

唐世平 曹筱阳

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大国的关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国和美、日、俄及印度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更是事关亚太地区、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在这里,作者将讨论对中国最至关重要但又是难以处理的三边关系:中美日关系。

尽管国家之间越来越意识到合作对各自的好处,但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合作,<sup>①</sup>特别是能够支撑相互安全的合作始终是困难的。许多时候,国家“在特定场合下达成的合作或妥协”(ad hoc cooperation or compromise)往往只能达到化解危机的效果,却无法在国家间建立富有韧性的相互安全合作。这是因为即便国家间存在寻求相互安全的意愿,但如果不存在寻求相互安全的基点的话,合作即使达成也是极其脆弱的。

在影响国家安全环境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四个主要因素中,“地理环境因素”和“国家的内部发展及相互作用”对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寻求相互安全的基点最为重要。<sup>②</sup>因此,作者将以这两个变量对中美日三边关系未来走向的影响为主线,来讨论中美日三国之间相互安全的基点这一问题。在国家内部发展及相互作用这一个方面,作者又将偏重于讨论这三个国家国内有关国家安全理念的辩论对相互安全基点的影响。这是因为当人们对中美日三国的国力没有太多置疑的时候,三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和态度,或者说三个国家追求国家安全的理念和方式对它们间的相互安全更为重要。

## 一.重新审视中美日关系： 联盟内和联盟外政治

在深入讨论中美日关系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纠正对中美日关系一个最根本的误解。这一误解就是,如今的中美日关系是三角关系。

一个正常的三角关系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两个国家联合起来针对剩下的一方的可能性。但是,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基本上不存在中日联合起来对付美国,或者中美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中国和美日的任何一方之间都只存在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战术配合,不可能存在战略合作来对付剩下的一方。因此,中美日关系不是一个三角关系,而是一个联盟(美日)对另一个国家(中国)的关系。

我们当然不否认,在经济领域确实存在着其中任何两方联合起来对付另一方的可能性。作为相互依存广泛而深入的世界第一和第二的经济大国,美日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众多的经济纠纷。冷战结束后,由于没有确定的外来威胁,美日两国都能够有较大的自由追求,在经济领域中的相对得失更使得美日经济纠纷变得愈加频繁和尖锐。但是,这种经济纠纷不可能真正危及美国和日本在安全和政治方面的同盟关系,而且一旦美日认为两国面临共同的迫切外在威胁,两国就会试图缓解这方面的分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美日关系是个双边关系：美日在一方，中国为国一方。

歧。<sup>[5]</sup>因此，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美日关系是个双边关系：美日在一方，中国为国一方。

于是我们可以认定，在安全和政治这两个领域里，美日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只是联盟内部的政治（intra-alliance politics）的正常表现，其性质和三角关系中的双边关系有质的区别。<sup>[6]</sup>

联盟内部的政治中最基本的问题是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卷入（entrapment）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日美同盟中最基本的矛盾是，一方面日本担心美国丢下日本不管，美国却担心日本脱离美国而去独立行事；另一方面则是美国担心被日本拖进冲突的泥潭，日本却担心在一些情况下为了维持同盟不得不支持美国而卷入冲突。

此外，美日同盟还是一个不对等的联盟关系，这一点和目前更趋平等的美欧联盟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在不对等的联盟关系中，联盟内部的政治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间的矛盾：1）作为弱小的一方，日本总是希望能有一些独立的声音和更平等的地位，而美国则会尽力维持他的领导地位；2）美国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维持联盟，会允许日本获得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度，以安抚并留住日本。

联盟内政治同样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只不过它发生在盟国之间）。在日美的讨价还价中，美国是联盟的领导者，而且美国很清楚日本基本上没有脱离美日联盟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谈判地位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只要美国决心已定，美国最后总会占上风。大多数时候，日本即使反对，最后也不得不跟随美国。日本在一些时候想采取一些独立策略，但最终都会因为谈判地位较弱而向美国妥协。<sup>[7]</sup>这种情况在日美同盟面对明显的外部威胁的冷战时期尤其明显，只不过在冷战时的大多数时间，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需要日本，因而不愿太跟日本计较。

冷战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1990-95/6年间），由于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美国不再对日本一味容忍，日本也不再一味服从美国，因此，两国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和纠纷变得尖锐和频繁。但是，在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台海危机后），美国（也包括日本）逐渐将中国当成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日本对中国的担心程度也加重，因此，美

日安全同盟重新走向紧密化。

美日之间在后冷战初期不断的经济纠纷使许多人认为美日存在了足够多的冲突，美日同盟因此而弱化，中美日三国关系也就变得更像是一个三角关系了（或者至少是非等边三角关系）。这种理解不仅是相互矛盾的（因为美日仍是同盟），而且也阻碍了我们去更深入地了解三国关系的复杂性，从而难以制定有效的政策。尤其是在对日本的一些政策上，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美日同盟内政治的规律，多少出现了一些偏差。这其中的一种思路就是谋求中美日关系的平衡发展。<sup>[8]</sup>

如果我们理解联盟内部政治的规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谋求中美日关系的平衡发展”的做法最后的结果将是适得其反。因为这实质上意味着要美国将日本和中国置于同等的地位上，而这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让美国，特别是日本认为中国是想离间美日关系，从而使得他们更加怀疑中国的意图并更加努力地维护他们的联盟。

最后，联盟在面对重大的危机事件时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就美日同盟而言，最可怕的危机是台湾海峡可能爆发的冲突。如果台湾海峡爆发冲突，美国的卷入是必然的，而日本则面临着一个极其困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如果卷入危机，作为同盟中的前线国家（frontline state），其面临的报复打击相比美国要严重得多，因此，日本并不愿意卷入台海危机。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在台海危机美国卷入时不支持美国，日美同盟就面临破裂的危险，这一结局对于日本来说同样也是不愿接受的。鉴于日本面对危机的两难境地，如果说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还有可能是战与和都行的话，日本的态度则是希望竭力避免台海爆发危机。而为了能够阻吓危机的爆发，日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地支持美国。

## 二.寻找相互安全的基本点

### 1.地理环境因素：海洋和陆地国家的对峙

在确立了中美日之间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一个双边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试图真正地理解三国之间存在的的关系。

就地理因素而言，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美日是海洋国家，而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大陆国家，或者说是一个陆海

中国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了。



我军访美

复合型国家。

日本是三个国家中最脆弱的一个。其国土面积狭小,主要的战略资源都需要进口,而且其能源进口的海上通道要通过几个重要的海上咽喉地区。日本作为离亚洲大陆和中国更近(如同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美日联盟中的前线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更为敏感和脆弱。因此,从日本的角度出发,美日同盟的作用在于能保障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打消中国任何潜在的控制太平洋或日本海上生命线的企图,同时解除任何中美联合起来打压日本的机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比起美国来更不希望中美真的走向对抗,或者直接的战争。这是因为当中美走向对抗时日本站在美国的一边,就意味着日本将和一个重要的邻国成为长期的敌人。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周边国家(特别是重要国家)长期交恶对当事国的长远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海洋复合国家,其面对的地理环境是极其复杂的。中国的邻国多达十几个,其中还包括美日俄印四个重要的大国。这些大国和中国一样都会形成一定的势力范围,而有时候这种势力范围会产生冲

突。面对美日这样的海洋国家,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显然是战略纵深。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彻底走向了以沿海地区为经济中心的经济体系,且这一格局即便在中国启动了西部大开发的计划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不会改变。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了。但是,一旦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将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而必须冒和美国开战的危险完成中国的统一。因此,中国一方面试图说服美国共同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得不发展一些能够阻吓美日军事卷入台海危机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不是

要挑战美日的海上优势,而是要求美日同盟尊重中国最生死攸关的正当利益。

相比之下,美国的地理位置是三个国家中(也可以说是所有国家中)最得天独厚的,其拥有的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剩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就中美日关系来说,美国本土与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地区相隔遥远,可能遭受的打击也就最小。此外,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现有的国际结构下,美国的行动基本上不受太多的约束,因此美国是这三个国家中行动自由度最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美国更容易有自恃其安全剩余的优势而执行冒险政策的心态。

地理环境因素对美日联盟和中国的影响还表现为:与目前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都是美国盟友的情况相比,亚洲大陆并非如此。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和俄罗斯在经历了长期的猜疑和对抗之后,终于达成了相当程度的战略理解,而且这种战略理解多少有些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的因素。在亚洲大陆,只要中俄两国能保持业已形成的相互战略支撑,就会和欧洲大陆截然不同:一个中俄两国能保持合作的亚洲大陆是美日同

总的说来,日本国内的不同派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日本应该拥有更高的国际地位。

盟无法单独支配的区域。这样一来,在亚洲大陆,美国和日本要么和中俄两国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要么就只能执行一种类似于离岸平衡的战略(off-shore balancing)。这两种结局都是中国和俄罗斯可以接受的。

亚洲大陆(特别是东亚)和欧洲大陆的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是亚洲大陆的边缘存在着一个几乎完整的岛链,而这些岛链因为其离亚洲大陆的不同距离构成了一个战略纵深,使得属于海权国家的美国(日本)能够依赖海军构筑牢固的战略防御。这样一来,只要没有能够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力量,美国就能够控制局势。美国的这种安全感也许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达成一定的战略理解。

2.中美日三国的安全理念

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基于对国际政治的不同假设,发展出了如今国际政治中的几个主要理论。国家领导人的心目中也存在着对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看法,或者说“国际政治观”。这种“国际政治观”类似于国际政治学者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理解。

因此,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就可以将国家领导人的“国际政治观”也归类到目前国际政治关于国家安全的三种主要理论中去: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这样做能够使我们针对不同国家的安全政策、其背后的理念、政策的后果以及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即中美日三国间是否存在安全合作的基点得出更合逻辑的理解。

日本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日本未来战略的大辩论。与其他国家关于安全战略的大辩论相比,日本的关于对外战略的大辩论和国家的未来走向更加紧密相连。

总的说来,日本国内的不同派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日本应该拥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有更有力的声音,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不同派别之间的区别更多的是在于日本具体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以何种手段达到目的。不同学派的观点经常相互交叉,不同学派的人士可能都支持日本采取同样的行动,但出发点不同。

日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基本上是由一些激进的

“亚洲国际派”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认为日本树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比起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要优越得多。因此,日本不仅应该号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向日本学习,同时要求欧美也给日本以足够的尊敬。日本许多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还认为日本应该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大国。从根本上说,这派人士希望世界重新回到大国争雄,而日本是其中一员的时代。在历史问题上,这派人士认为日本的侵略只是大国争霸的必要,甚至是为了“解放亚洲”,因而不存在正确面对的问题。他们也都强调围堵中国的必要性。

日本国内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大体上是追求“正常国家”的“理性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士认为,国际政治已经从领土扩张的野蛮时代走向了文明时代,这样,即便日本不是一个军事大国,日本也能够获得安全。美日安全同盟的存在更使得日本并不需要大规模的扩张军力。但是,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明确一些已经是既成事实的东西(比如日本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等)。这些人士中的大多数并不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但也不愿在历史问题上作更多的努力,而是希望亚洲国家“放日本一马”。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中国的态度是务实的。他们同意中国的未来走向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但他们不支持对中国采取“遏制”措施,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重新回到自我封闭的状态,对亚洲更加不利。

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派的人士基本上都认为日本应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独特的文明,而不是依赖强大的军事力量去获取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人士大多数都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希望日本主动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这样才能获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和支持,让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地区安全政策上,这些人士希望看到多边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在对中国的政策上,这些人士都希望将中国纳入一个地区体系中去,而不应该排斥中国。这些人士尽管认为日本不应脱离日美同盟,但同时都反对美国对中国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

从目前的态势看,尽管各种理念相互争夺,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反映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思想。不同的政府可能也会吸收一些新自由主义或者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念(比如小渊政府夹杂



布什政府目前的政策基本上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着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而小泉政府的理念则有一些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色彩),但基调都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日本外交战略基本上是争取更多的国际声音和影响力,但又不希望冒过多的风险(比如脱离日美同盟,成为军事化大国)。

#### 美国

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国际道德的国家,因而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目前的国际地位。一份从未公开的报告《国防计划纲要》指出,美国的战略核心就是“防止任何潜在的全球竞争者的出现”。这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想在老布什时期就存在,而且得到了当时国防部长切尼的认可。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基本上继承了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人士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因此,美国必须准备和中国开战,同时采取各种措施以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幸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中依然是主流。



明治·维新后能否成为“正常国家”?

美国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尽管也认为应该尽可能维持美国目前的国际地位,但这些人士认为国际秩序的更迭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此外,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到处为所欲为。因此,美国不能过于鲁莽,而是应该有选择性地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并不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因此美国最坏的战略就是在中国的未来走向还不确定的时候,使中国成为敌人。<sup>[7]</sup>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随着中国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不深化和广泛,中国将逐渐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并越来越接受国际准则和国际机制的约束,因而不再会寻求以武力来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中国不得不逐渐融入现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华温和政策的基础上,和中国一起合作构筑公平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从而让中国成为该秩序的拥护者而不是破坏者。

和克林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基点,但带有相当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安全政策相比,布什政府目前的政策基本上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 中国

中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美国将会采取各种手段来限制中国的发展,甚至有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打击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必须牺牲一定的眼前利益,尽快地全面发展军力,以图能够在军事上尽快和美国抗衡。这些人士的观点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布什政府强烈推行导弹防御系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证据,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该放弃“和平与发展”的理念。

中国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承认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性越来越高,但他们认为美国并不会主动与中国为敌,因而中美之间存在着达成战略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意识到两国要达成战略理解和合作会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因此强调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不过分追求军力的扩张,但是必须拥有足够的威慑能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占据了中国安全战略讨论的主流,

中国主流的意见仍是以“韬光养晦”为口号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加上一定多边合作的战略思想。

表 1 威胁判断和安全理念信仰对大战略的影响

中国的大战略 :总体上的延续性

威胁判断 \ 信仰	进攻性现实主义	防守型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美国会蓄意阻止中国强大	挑战美国	等待时机 ,改变现状	不可能
美国不会蓄意阻止中国强大	不可能	有节制的融入	尽量融入

美国的大战略 :轮流执政的变迁

威胁判断 \ 信仰	进攻性现实主义	防守型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中国注定要与美国为敌	围堵 ,甚至先发制人	以围堵为主	不可能
中国不一定与美国为敌	不可能	以接触为主	将中国融入现有秩序

日本的大战略 :总体上的延续性

威胁判断 \ 信仰	进攻性现实主义	防守型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中国注定是敌人	更紧密的美日同盟 , 扩充军备 ,甚至先发制人	围堵为主 ,但不排除接触	不可能
中国不一定是敌人	不可能	以接触为主	将中国融入现有秩序。日本作为榜样和桥梁不可能
美国是成为“正常国家”的最大阻碍	挑战美国	等待时机 ,改变现状	不可能
美国不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阻碍	不可能	利用美国 ,改变现状	“全球市民国家”

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的“自我克制”实现的影响。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对中国并无敌意 ,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警惕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 ,这些人士认为只要中国稳步地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 ,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去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会变得更加友好。由于这部分人士的一些观点很容易陷入“民主和平论”的论调 ,大多数中国的精英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仍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很难成为主流的声音。

总体说来 ,在中国的战略理念讨论中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被认为是不理智的 ,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则被认为是可能过于理想主义了。因此 ,主流的意见仍是

以“韬光养晦”为口号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加上一定多边合作的战略思想。

三.寻求相互安全的战略 :理想与现实

1.威胁判断和基本战略选择

在总体安全理念之外 ,决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就是国家对威胁的判断。当然 ,在一定程度上 ,不同的人士对威胁的判断和他们的基本安全理念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将中美日三国对威胁的判断和它们内部不同的三种安全理念结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三个国家的不同安全战略的矩阵

中国愿意在日本经济在亚洲仍处于主导地位时,建立一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

表 2 战略安全保证——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石

保证提供国\被保证国	美国	日本	中国
美国		保证日本的安全(包括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不抛弃日本	不主动威胁中国安全,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反对台湾独立。
日本	不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不排斥美国的亚太存在。		不主动威胁中国安全,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反对台湾独立。
中国	不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不排斥美国的亚太存在。	即便在中国统一后,中国也不会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见表 1)。这其中,中美两国因为都更多地集中精力关注对方的战略意图,大战略相对简单;而日本则因为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考虑,相对复杂一些。

2.相互战略保证:理想

防御性现实主义安全政策的核心在于意识到安全困境的存在,尽可能清晰地阐述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并相互提供安全保证:各方均不威胁对方的生死攸关的利益。针对三个国家的威胁判断,我们就可以得出不同国家最需要获得的安全保证(见表 2)。下面我们详细论述。

首先,由于日本是最需要别国提供安全保证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了日本主要安全保障的提供者。而最近因为中国国力的增长,再加上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顿和衰退,日本也开始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因此,日本也开始需要来自中国的安全保证。

中国能够向日本提供的战略安全保证大体上可以有这几个方面:

1)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统一不会威胁日本的利益,中国不会利用台湾的地理位置来企图控制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中国的核武器不会针对一个无核的日本。

2)中国可以支持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是,在当今国际社会日益相互依赖的时代,只有一个爱好和平,敢于面对历史,因而可以更好地承担维持国际和地区和平责任的日本才是一个“正常国家”。

3)在“正常国家”的框架下,中国支持日本自卫队

(或军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有更多的参与。但日本的军队必须在行动范围内有所自我限制,谨慎从事。而在日本正确面对其侵略历史并接受了时间考验后,中国将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4)中国愿意在日本经济在亚洲仍处于主导地位时,建立一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国理解日本出于安全的需要和美国在一段时间维持同盟关系,但中国希望最终亚太地区的安全是建立在包括所有大国的多边安全合作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峙的两个阵营上。东亚一体化的目标不是要排斥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或是削弱日本的安全。<sup>[8]</sup>

中国能够向美国提供的战略安全保证是:

1)中国不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sup>[9]</sup>中国反对的是美国恶意围堵中国。中国希望美国逐渐意识到在亚太地区形成两个相互猜疑的大国集团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类似于欧洲大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联盟变得越来越紧密,可地区局势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2)中国追求多极世界的方式是和平的。中国不会寻求主动突破世界格局。

3)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追求的是国家统一的合法利益,而不是扩张性的非合法利益。中国的统一不会威胁美国的海上优势。

作为相对弱小的国家,中国需要的战略安全保障也是多方面的。美国和日本作为一个联盟能够向中国提供的战略安全保证至少应该包括:

1)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中国最生死攸关的安

由于布什政府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美国就成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流氓国家”。

全利益,因此,美国和日本都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并接受一个统一中国的到来。<sup>[10]</sup>美国和日本都必须意识到一个分裂的中国将始终是亚太地区的不确定因素,而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才会有与美日(还有俄罗斯)共同承担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意愿。中国极愿意成为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但那必须是在统一之后。

2) 美日联盟不主动威胁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中国的最低威慑能力。任何美国和日本要发展的对付所谓的“无赖国家”的导弹防御系统都必须是有限的,而不是目前的这种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防御系统。

3) 美日不能继续强化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安全联盟,而是必须朝着一个多变的安全合作机制迈进。而为了不让中国感到是美国和他的盟国共同对付中国,这一多边安全机制还必须包括和中国关系接近的国家。

4) 日本保证不抛弃和平宪法。日本的任何出兵海外的活动都必须也只能是在联合国下的维和行动。

5) 日本的政治家正确地面对历史,并且使日本国内达成对过去侵略历史的正确共识。

在以上的相互提供战略安全保证的基础上,中美日三国(以及俄罗斯)还应该接受一些共同的安全理念,才有可能在亚太地区达成存在大国间的多边安全合作,或者“大国协作”。这些理念大体上可以概括成:“自我克制”和“接受约束”。

首先,各个大国应该意识到防御性现实主义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共同容忍安全是相对的,因而应该“自我克制”。比如,中国从某种程度上理解日本的一些不安和维持美日安全同盟的需要。但该同盟的关系已经足够预防很多突发事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变得更加紧密。日美同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机制已经变得十分显著。因此,美国和日本应该在其联盟政策上有所节制,而且这一联盟应该最终为一个多边的安全协作机制所取代。<sup>[11]</sup>

其次,大国还必须接受他们的行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其他国家所限制。只有这样,这些大国组成的大国协作才能在道义上要求其它国家保持克制,而不需要过多的压力外交。

总之,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政策必须充分体现对安全困境的理解,从而使得国家的政策即便在没有外在

压力的情形下仍然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我克制,并且接受合理的行动自由被限制。

四.现实的差距 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1.短期的问题

在现行的政策上,中日政府执行的安全政策总体上都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不幸的是,布什政府上台后一直到美国遭受 911 恐怖袭击之前,执行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更接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从而使中美之间在克林顿政府后期达成的战略理解大大倒退,也使得中美之间达成相互安全变得更加困难。

当一个国家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略时,其他国家是很难和其达成妥协的。这时候,这个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的大国基本上就像“流氓国家”(rogue state),或者说是建构主义中提到的“掠夺性国家”(predator state),使得整个国际政治都变得更加危险。<sup>[12]</sup>而在现阶段,由于布什政府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美国就成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流氓国家”。

911 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大大削弱了其政策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这为美国和它的盟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重新定位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但是,这种转变完全可能只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应忽视美国一些精英的态度有可能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可能性,但这还有待于观察。从目前来看,在 911 后美国国内的政策辩论中,原来是强硬派的还是强硬派,原来是温和派的还是温和派,似乎没有思想大转变的迹象。按照这样的逻辑,判定布什本人的态度转变是否具有持久性必须谨慎。

能够庆幸的是在美国精英的辩论中,防御性现实主义仍是主流意见。而美国作为一个轮流执政的国家,不同的主义都有可能成为某一届政府的政策出发点。因此,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先礼后兵的“以牙还牙”(Tit-for-Tat),但斗而不破。“Tit-for-Tat”战略是国际关系理论剖析出的在冲突中寻求合作的最佳战略。和大多数人的直觉相悖,面对强硬的政策一味退让不仅不能让对方温和起来,反而会让强硬派在内部辩论中占据更有力的位置。这是因为强硬派人士可以说采取强硬立场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即迫使中国让步),因此应该继续强硬政策。事实



如果布什在结束反恐战争后又重新回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的话,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就应该是尽可能地阻止美国对中国利益的侵犯。

上,已经有相当一些美国人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sup>[3]</sup>

也就是说,如果布什在结束反恐战争后又重新回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的话,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就应该是尽可能地阻止美国对中国利益的侵犯,联合其他国家以迫使美国回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中国希望的结果是布什执行的政策不仅在国际上不得人心,而且也导致美国人民对它丧失信心。这样,布什要么放弃原来的安全理念,要么失去制定美国安全政策的权力。

面对里根政府,我们不惜让关系倒退;面对克林顿的执迷不悟,我们不惜军事对峙,都最终迫使美国政府回到了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上,达到了我们的目标。最近,面对国际社会对美国政策的众多批评和国内政治的压力,布什政府已经体会到不能我行我素,在一些问题上有一些战术退却的迹象。这一点,也印证了上面提到的“以牙还牙”政策的可行性。

在中日关系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和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使得中日之间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和解。特别是由于历史问题的存在,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似乎是不可逾越的。

## 2. 长期的问题

显然,即便美日都采取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政策,要求美日同盟,特别是美国向中国以实际行动作出战略安全保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美国是一个习惯以黑白分明眼光看待世界的国家,它只习惯向其盟国提供战略安全保证,而不习惯向有可能成为美国竞争对手的中国提供战略安全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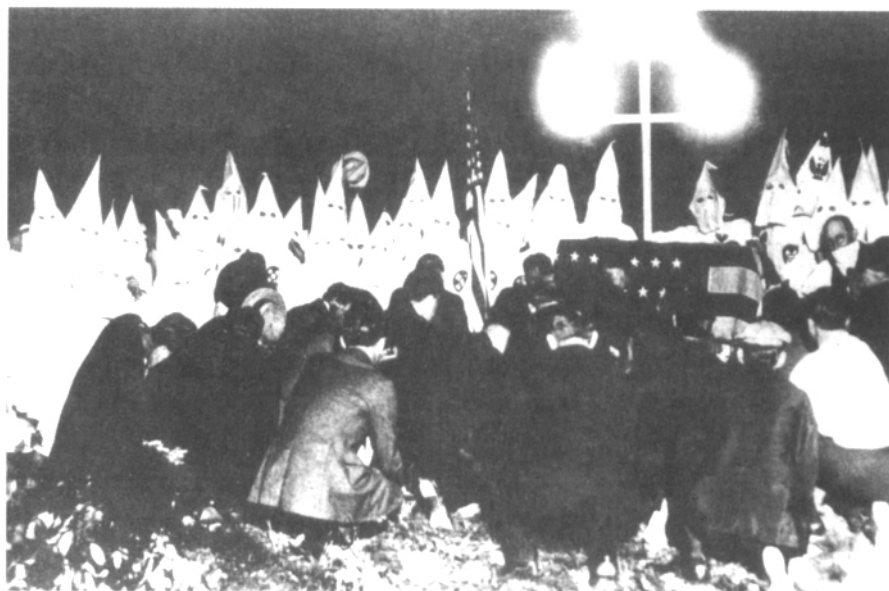
从历史看,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美国只有在冷战期间和中国基本上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时,向中国提供过战略安全保证。在冷战结束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

一直是在安全上要求中国付出,却从未向中国许诺过任何切实的回报。美国经常采取的谈判战略是一种很无赖,但十分有效的策略:先制裁一个国家,然后要求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让步,可这个国家得到的唯一奖励只是回到没被制裁的从前。

和美国难以达成战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行动空间比起其他国家有更大的自由度。美国总是难以抵制来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诱惑,也没有耐心去寻求安全合作。美国更不希望自己的安全政策受到他国的制约,即便这种相互制约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有好处。美国作为目前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领导者,习惯了我行我素。

另一个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因素是美国对其国家的所谓“信誉”(credibility)的过度崇拜。尽管这种对“信誉”的过度关心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没有理由的,<sup>[4]</sup>但是美国的领导人似乎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而且他们对信誉的过度迷信在单极世界下会更加严重。

这种对“信誉”的盲信和国际结构对美国的约束力下降共同构成了美国冷战后行为方式的基本驱动力,使得寻求和美国达成战略理解变得愈加困难。



建构主义的“掠夺性国家”?

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应该鼓励日本国内关于“正常国家”的辩论,或者至少保持一种冷静观察的态度。

在日本,主张日美军事同盟最终应该被多边大国合作机制所替代的声音尽管存在,但也仍然是少数派。日本国内的意见基本上都认为日美安全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基石,对任何有可能动摇这一基石的思想都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日本对其未来走向的辩论似乎仍停留在“脱亚入欧”、“脱欧入亚”、“入欧入亚”的水平上。但是,即便是“入欧入亚”派提出的日本要成为欧美和东亚地区间桥梁的理念也无异于日本进行自我边缘化。东亚的几个重要经济实体中,了解美国和西欧的人士决不亚于日本,他们不再需要日本作为桥梁。

因此,日本必须“以亚入欧”。如今的 10+3 框架给日本提供了一个真正融入亚洲,特别和中国一起学习合作的机制和场所:只有一个真正融入了东亚区域的日本才不用担心亚洲对它的疑虑,然后才能更加自信地“入欧”,进而在世界上发挥更建设性和重要的作用,获得其所追求的国际地位。

日本有关如何面对历史和日本的未来向何处去的讨论显然触及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理念问题。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涉及的问题只有通过人民广泛参与的辩论才能解决,因此,日本未来的走向归根到底也取决于日本国内的大辩论。为此,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应该鼓励日本国内关于“正常国家”的辩论,或者至少保持一种冷静观察的态度。无论如何,只有建立在强大民意基础上的“正常国家”理念才是日本未来稳定的立国之本。

但是,当我们看到日本关于日本未来的辩论有重新回到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的趋势时,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有责任和义务联合整个国际社会警告日本,为了亚洲、世界和日本本身的利益阻止日本重蹈历史覆辙。

总之,日本对其国家未来角色的不确定和对历史问题的矛盾心理共同限制了日本安全思想中的新思维。<sup>[5]</sup>

结论

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从根本上并没有接受台湾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却不是美国和日本的生死攸关的利益,甚至不是他们的重要利益的事实。因此,美日和

中国在这一点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这样一来,在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中美日三国能够达成的任何战略理解都将是脆弱的,至少是难以达成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理解:中美在 1997-1998 年间达成的和解被证明是短暂和不牢固的。

因此,在中美日(俄)之间建立相互安全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准备来执行一个长期的战略。这一个战略的目标不是要拆散美日安全同盟而孤立日本和将美国赶出亚洲,而是要逐步用一个多边的安全合作机制来代替日美同盟,从而消除在亚太地区形成两个对抗的阵营的局面的可能性。中国需要做的是必须一方面抵御来自美日的军事同盟,同时不放弃和美国日本及俄罗斯达成大国合作的可能性,并且为此而发挥想象力。而当美国政府回归到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中国和俄罗斯都应该试图和美国日本达成更广泛的战略理解,谋求一个多边的安全合作机制以保障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这样一个大国合作机制的第一步,中国应该在朝鲜半岛的演变过程中扮演更加积极和富于想象力的角色。在朝鲜半岛事务和半岛统一后的政治走向问题上,中国可以、应该也必须应该利用朝鲜半岛统一的历史性机遇推动中美日俄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理解,为未来达成更广阔的大国战略协作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注释:

[1] 在国际政治的讨论中,“合作”一般是指非军事同盟或联盟性质的“合作”。这方面的最新探讨,见: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1999), pp. 42-63.

[2] 唐世平,《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8 期,第 16-22 页。

[3] 最近布什政府宣布不再采取克林顿政府对日的强硬经济政策某种意义上正是反映了布什政府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迫在眉睫,因而美国更需要日本的支持的态度。见:David Singer, "A New Tact From U.S.: Treasury

Secretary Rejects Lecturing ToHyo," *IHT*, February 7, 2001.

[4]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6 (June 1984), pp. 461-95.

[5] Glenn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s among N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0-48.

[6] 吴心伯,《谋求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平衡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第20-24页。

[7] 这些人士包括了大多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典型的论点,见 Zbigniew Brzezinski, "Living with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9 (Spring 2000), pp. 5-21.

[8] 详细的讨论,见:唐世平、周小兵,《东盟-日本-中国和东亚的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6期。

[9] 事实上,中国已经向美国清楚地表示了这一点。

[10] 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最近表示日本应该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并且为促成和平统一而努力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参见“日本外相表示日本应为中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新华社东京2001年12月25日电。

[11]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64-66.

[12] 关于“掠夺性国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见:Alex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s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407-410.

[13] 例如:Hugo Restall, "Calling China's Bluff: why George Bush's China policy is working better than Clinton'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WSJ), August 22, 2001, p. 9.

[14] Shiping Tang, "The Cult of Credibility and State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forthcoming; James Fearon, "Signaling versu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es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8, No. 2 (June 1994), p. 265;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 冯昭奎,《日本:战略的贫困》,《世界知识》2001年第7期,第8-11页。